

##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托古改制」

■ 陳勇健

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  
馬來西亞道理書院

## 一、引言

「托古改制」是從中國先古聖王和上古制度中去尋找推動社會改革和立論根據，是以「借古」作為改制的具體實踐和行動的方法。<sup>[1]</sup>自古以來「托古改制」聞名者，除先秦諸子托古成風外，漢以後稱著者有新朝的王莽（公元前45-23）、宋代變法之王安石（1021-1086），以及晚清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1858-1927）。除了康有為的設想以外，前兩者可算直接參與了政治實踐和面臨考驗，尤以土地改革為甚。王莽的「王田制」與王安石「方田均稅法」皆有托古和「法先王」之鑒，藉以施行平均分田、均產和均稅等。惟盲目復古而未能根據現實制度，以及現有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來進行創新，而且忽略現實利益矛盾和歷史趨勢，將如同王莽改制改革失敗的下場。<sup>[2]</sup>

「井田」與相關制度，最初見於《春秋谷梁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

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sup>[3]</sup>進入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後，《孟子·滕文公上》也記載了孟子回答滕文公古時曾有「井地」的對話，具體形容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sup>[4]</sup>，往往成為後世進行激進土地改革時的傳統觀念依據。

同樣行「托古改制」立論者，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孫中山（1866-1925）也可謂近現代的立論佼佼者之一。1912年民國初肇之時，孫中山認為「三大主義」<sup>[5]</sup>中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等問題已算達成，因此呼籲實行最為重要的「民生主義」，並於演講中首次提到「井田」一詞，指出「平均地權」<sup>[6]</sup>之法系出「井田之法」，但因現實的中國地少人稠、面積無法平均、稅率不同，偏遠和繁盛地

區的土地價格天淵之別，所以井田制「板滯不可復用，則惟有師其意」。雖說如此，孫中山仍以「托古」井田制為根據，往後不停地檢討和發展「民生主義」理念，強調必須制訂平均之法來阻止土地投機業，故而提出照價納稅和土地國有兩策，藉以保障中國的實業革命與工商發達，達致國利民福。<sup>[7]</sup>

**摘要：**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一直被認為是受到自西方現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影響，然而從許多的根源和細節來看，其源自中國古代傳統主流思想的借鑒，並藉著「托古改制」的方式，與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現實做比較和改良，繼而合理化並形成了符合近現代中國特色的一套治國理念。本文以「托古改制」為中心，探討孫中山思想關於「民生主義」理念中各個時期的變化，重新發現「托古改制」的重要性和其進步意義。

**關鍵詞：**孫中山；民生主義；托古改制；井田制；三民主義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理念不僅以「托古」方法為構建依據，間中的演變亦值得被重新發現和探討。究以往對「民生主義」的文章，一為僅著重在討論思想層面，卻不根據時代脈絡進行梳理，難以觀察孫中山思想演變過程之餘，自然也不明白其因果；二則以「托古改制」來審視和比較孫中山思想，似乎未有人從此觀點出發和進行討論。本文將針對以上的兩個優缺點，對「民生主義」理念中各個時期的「托古改制」和其進步意義，放在一個清晰的脈絡上呈現與進一步討論。

## 一、初期對「社會主義」所認知的「托古」

晚清革命時期，孫中山對國外的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固然有接觸，但精確來說只稍有提及，更未曾有過具體研究或引介。孫中山最初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可能將它視為與同盟會創建時所主張的「平均地權」頗為相似。<sup>[8]</sup>辛亥革命至民國元年（1911-1912）這段期間，孫中山開始對「社會主義」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探討<sup>[9]</sup>，並將巧妙地運用在「民生主義」理論中。但他所謂的「社會主義」指的是「民生主義」中關於討論「社會革命」的一環，是指阻止金錢勢力壟斷實業並由國家施行大實業收歸國有和統籌的政策，只是「民生主義」主張「人民共用生產之自由」的一部分；而「平均地權」是該「社會主義」的前提，被認為是實業發達和資本壟斷前必須妥善解決；如孫中山所言：「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則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而「井田之法」在此時已正式被提及，而「平均地權」被確定為啟發自井田制<sup>[10]</sup>，與馬克思主義的關聯不大。孫中山甚至將這種能夠解決國民生計和使大多數國民享福、由國家來主導以防止資本家專制的「社會主義」略稱為「國家社會主義」，但強調該政策並非均貧富之主義。<sup>[11]</sup>

無奈民國建元後，中國一直處在國力不振、軍人混戰的動盪階段，孫中山多年來積極看重和推廣的「民生主義」理念不僅未能實現，時局紛亂也導致其顛簸流離，無從發揮和施展其「民生主義」抱負。但隨著1915年之新文化運動發起後，以及1917年俄國蘇維埃工農革命之勝利，將馬克思學說

順利引入中國，不僅鼓舞了文化人的追捧和研究，也連帶影響了離開廣州軍政府<sup>[12]</sup>後，將中華革命黨本部移往上海繼續革命的孫中山。<sup>[13]</sup>相比起1912年對「民生主義」作出的初步概念，孫中山在1919年的《三民主義》論著中，更明確地將「民生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sup>[14]</sup>。此「社會主義」不再僅是以往「民生主義」的其中一環或詮釋，而是被孫中山認定為「俄國已發其端，德國已見告矣，英、美諸國將恐不免也」的馬克思學說。相對1912年「民生主義」較專注於探討解決「平均地權」的問題，1919年的「民生主義」更偏向聲討「貧富不齊，豪強侵奪」等階級概念，進一步將歐美的時局和經濟革命納入參考，認為尚未經歷實業革命和資本發達階段的中國，是儘早解決土地問題的良機。<sup>[15]</sup>

一般認為，第一位將唯物主義運用於中國歷史分析，對中國古代封建制度賦予「原始共產主義」解釋的是同盟會元老胡漢民（1879-1936），並且將井田制比喻為中國古代相沿的共產制度。<sup>[16]</sup>其實早在1912年10月，孫中山已經稍有類似概念，並以井田制為例，認為「考諸歷史，我國固素主張社會主義者。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同居，又共產主義之嚆矢」，所以寄望久經蘊蓄「社會主義」精神的中國人，必能盡速解決平均社會生計的問題。<sup>[17]</sup>因此，王爾敏指出，孫中山思想一都直有回顧前古和引據前代人物故事為申述的特色<sup>[18]</sup>，不過後者的特色與活用，則是1920年代才逐漸明朗。

## 二、馬克思學說兼「托古」的「民生主義」

受到馬克思學說影響的孫中山，於1920年二度回到廣州舉旗護法<sup>[19]</sup>，次年再度為「三民主義」擬訂具體方針。此時，新文化運動旗手的胡適（1891-1962）針對古代是否存在井田制之疑問，發表《井田辯》兩篇藉以回應國民黨內唯物主義者如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等，舉證「井田制」是漢初儒家再借孟子「托古改制」的造假「烏托邦」（utopia）。<sup>[20]</sup>井田制有無的爭辯，民國迄今為止已進行無數回爭論，仍舊因缺乏新材料而存疑<sup>[21]</sup>，

但回歸當時的歷史語境，也未能阻止孫中山藉「托古」，並吸收和運用於創新理論，以便回應當時複雜的社會問題與世局態變。

其中「民生主義」一項，孫中山強調要「行資產國有制，借機器以興實業」，並且由政府來實施公平徵稅與制訂地價。孫中山針對土地問題再次引據井田制：「吾國古時，嘗有井田之制，與平均地權，用意正同」，而「平均地權」是「民生主義」以國利民福為指歸的最大關鍵，所以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無法偏離「平均地權」，革命成功須優先解決土地問題。<sup>[22]</sup>孫中山雖藉馬克思學說來為「三民主義」立論，但其結合了「托古」方法，旨在合乎中國實際國情和歷史傳統上解釋貧富問題和土地問題的迫切性。再則，「民生主義」是為了達到「普利一般人民，消滅階級戰爭」為目的，主張由國家來實施均分和協調貧富矛盾，並不鼓勵階級抗爭合對立。猶如一些學者所說，國民黨早期只是借唯物史觀予以宣傳和運用，不甚認同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sup>[23]</sup>

但於1923年1月，經「六一六事件」遭粵軍總司令陳炯明(1878-1933)驅逐出廣州政權的孫中山，在上海會晤蘇聯駐華大使越飛(Adolph Joffe, 1883-1927)後，一同共商國民黨與蘇聯之合作關係，並對外宣告國共聯合之成立。次年1月，在蘇聯軍事援助和穩定廣州軍事政權後，國民黨完成改組和發表大會宣言，強調「三民主義」是「對於中國之現狀而謀救濟之方策」和「中國唯一生路」<sup>[24]</sup>。孫中山乘國民黨改組後，分別於該年3、4和8月陸續發表了《三民主義》系列講話，再次對「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詮釋，成為日後該思想和原理的最終定論。

在〈民權主義〉講話中，孫中山闡明了「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sup>[25]</sup>」。<sup>[26]</sup>根據孫中山的演講，他首先解釋「民生主義」與「社會/共產主義」的異同，也肯定馬克思和「『科學派』社會主義」在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貢獻，但更令他贊同的是俄裔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猶太裔牙醫威廉氏(Maurice William, 1881-1973)《社會史觀》(*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書<sup>[27]</sup>有關「社會問題才是歷史重心」之說法和對物質論的

批判，被其認為符合「民生主義」的概念。他的定義是，社會問題和歷史的重心歸於民生，採用「民生」一詞用來解釋社會問題，會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得確實和明瞭。<sup>[28]</sup>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觀點之認同和融進「民生主義」之舉，確切來說是受到威廉氏的個人觀點的影響。況且，孫中山不甚認同馬克思關於「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必然性，而指出分配的社會化才是最好社會進化，認為經濟利益調和後，大多數人才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所以，孫中山覺得階級戰爭論是「倒果為因」，馬克思只是「社會病理家」，而非「社會生理家」。

孫中山並非全然否定馬克思學說，而是認為馬克思本人身處的年代和判斷，與歐美各國之後所發生的成效事實遠不相符，所以不認同消滅資本家就能解決社會問題，相反的，分配社會化與提升民生消費，才能振興經濟實業。<sup>[29]</sup>故此看來，「民生主義」理論有「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克思學說，但不盡同意和照搬原樣，反之從「社會主義」汲取適合的條件，加以善用於「民生主義」的合理解釋之中。

孫中山十分清楚「民生主義」的界定，他並不反對「社會/共產主義」，甚至也認同「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惟分別在於運用方法。他並不反對「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之說，但也稱共產主義制度並非馬克思的獨有發明。面對當時中國尚處貧困落後的階段，他倡議解決土地問題的方式是按照中國國情來徵稅和收買，堅持由政府來實施「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以便能製造國家資本和創造實業，藉以消弭社會貧富不均和制定土地政策等。<sup>[30]</sup>所以，「民生主義」無疑就是孫中山理想的「中國式」的「社會/共產主義」，在不偏離「民有、民治、民享」等民本共用基礎上，才能成就中國的「共產主義」。

### 三、「民生主義」托古改制的完成

除了「社會/共產主義」之說，孫中山也稱「民生主義」為「大同主義」，可謂「托古改制」的一大特例。「大同」一詞出自《禮記》的〈禮運·大同篇〉，被認為是儒家對理想社會所持有的設想。晚

清時期的康有為即著有《大同書》，運用「托古」建構自己想像中美好的「大同社會」，被認為是一種近代化傳統的「烏托邦」情結和理念<sup>[31]</sup>。

孫中山對「民生主義」的補充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sup>[32]</sup>，惟其思想中存有孔子（前551-479）的影子實也不奇怪，好比最著名的莫過於「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句革命名言，雖然系出《周易》，孫中山卻是引自孔子之言。<sup>[33]</sup>孫中山雖和多數晚清出生者般熟於經典，但究其大量引據古人言托以改制，除了初期受傳統教育和生活環境影響而予以引述外，運用於著述理論大概是1920年代前後才湧現。不過，孫中山即便西化程度非常高和較為全面，卻並不阻礙其反復將儒家思想挪用和改造於革命論述中，至於其晚年思想何以一方面深受新文化思潮的激蕩所影響，另一方面卻又藉傳統儒學如孔孟學說中尋求解釋？李吉奎認為，孫中山的傳統思想主要表現在解釋《三民主義》的演講，肯定之餘也作出改造，目的是提倡民族價值，同時弘揚普世價值。<sup>[34]</sup>但其實，孫中山是以更突出的「托古」，來完整化表現和詮釋其「三民主義」之根本是源自中國，而非西方的「社會/共產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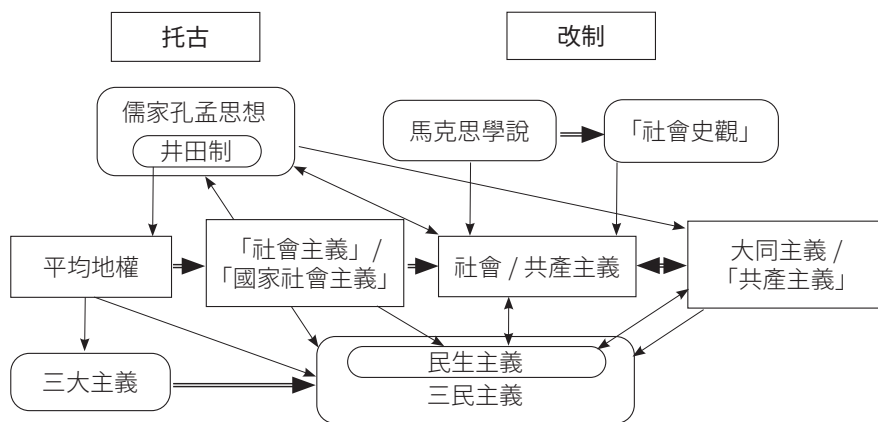
1924年2月，孫中山在一場談話中否定「三民主義」是他人或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的糟粕，覺得「共產主義」不過是中國古代也已實踐過的「小理想者」，並指出「三民主義首淵於孟子，更基於程伊川之說，孟子實為我等民主主義之鼻祖」、「社會改造本導於程伊川，乃民生主義之先覺。其說民主、尊民生之議論，見之於二程語絲」、「民族主義，我輩於孟子得一暗示，復鑒於近世之世界情勢而提倡之也」

<sup>[35]</sup>，除了再次肯定「三民主義」思想為孔孟所啟發，北宋理學家程顥和程頤竟也成為「三民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思想淵源之一<sup>[36]</sup>，但總歸其要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

此外，孟子（約公元前372-289）亦可說是孫中山思想在傳統層面上，最基本的

理論建設藍圖和參照，從最初的「平均地權」的土地國有化和徵稅均分、主張共和民主與人民平等<sup>[37]</sup>，到《孫文學說》中探討建立民國的心理建設和行為哲學<sup>[38]</sup>，以及「三民主義」理論中關於「民生主義」綱領的構建等，都擺脫不了對孟子民本政治的深遠影響；時代、方法或有所不同，但二者都致力於解決生活問題。<sup>[39]</sup>孟子所主張的理想社會，首先建立在吃飯問題上<sup>[40]</sup>，因此孫中山劈頭就指「民生主義」是吃飯問題，然而解決吃飽穿暖問題不能只限於空談，國家必須以「養民」作為目的，這點無疑為儒家的經濟思想<sup>[41]</sup>。「民生主義」便主張授田於無地農民「耕者有其田」以提高農業生產，解決農業問題和增產，發展現代化工業以輔助生產技術和防災等。<sup>[42]</sup>於是，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大民生政策必須落實，以阻擾資本壟斷和產生貧富不均問題；同時也要鼓勵振興實業發展，以國家資本來改良資本壟斷問題。<sup>[43]</sup>

可見，孫中山對於中國現代化方案，並非單純的是以國富民強作為止境，而是一個公平和均富的中國<sup>[44]</sup>，以便能在現代國家中，打造與孔孟等古人相比擬的崇高的理想社會。孫中山將儒家傳統關於解決社會問題的理念，借「托古」達致穿針引線的功用，從中國古代傳統的民本思想與西方左派民主思想中尋找符合中國和現代化的實際情形，重新探討、批判和比較，並且各取其精華再進行磨合，最終統合改造成為《三民主義》思想的《民生主義》綱領，以契合當時中國國情、社會問題和歷史傳統為出發點的「社會/共產主義」版本。



## 結語

「托古改制」方法和實踐的理想主義，一般被認為是「烏托邦」的空想，或是因其付諸於復古行為的思想而遭到批判和否定。不過，烏托邦和理想主義兩者之間定迄今都被歸為相同意義，卻仍有不同的理論根據和敘事邏輯，烏托邦理念被認為與取消主義和逃避主義存有雷同，不僅否定現存社會組織，更意圖體現完美的新組織來取而代之。<sup>[45]</sup>「托古」未必是單純地重古、復古，或者是單獨的不滿和理想價值的體現，而是針對現實社會問題的一種反省、改良、革新和創新。<sup>[46]</sup>井田制從古迄今是個反復被提及和「托古」的土地制度理想模式，無歷代社會改革者甘於充作依據借鑒並改良，在不脫離中國傳統理想主義的軌跡和前提下，藉以完成當前的社會改革範式。「托古改制」可被視為改革者針對因時之相關制度，恆古不變的理想依據或傳統啟蒙途徑。

孫中山從革命起義開始，便苦於針對其革命建國理論，進行多次托古立言。最初以效法井田制為號召，來解釋同盟會的「平均地權」理念，並將它發展成為「民生主義」思想最主要的部分，再與當時模糊認知的「社會主義」作結合討論。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加強，是新文化運動和俄國革命後，在馬克思學說的影響下，把「民生主義」與「社會/共產主義」劃上等號，藉此解釋「社會/共產主義」的均產精神在中國其實自古有之，那就是井田制。

馬克思學說雖補充「民生主義」貧富不均和土地問題的論述，惟孫中山不盡全盤接受，而是按照中國實際的情況，從「社會/共產主義」理論中取經和運用，成為以中國為主體、以調和貧富矛盾和民本共用作為目標，而非強調階級鬥爭和平均主義。歷經多番嘗試，孫中山終於從西方「社會/共產主義」思想的探索、比較和分析，再從中國古代的根本上尋覓解釋和替代，為「民生主義」找到了「社會/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根源，即中國傳統和儒家思想所宣導的社會理想主義，將「托古改制」發揮得淋漓盡致，成功結合並貫通了中國民本和西方民主思想所共同追尋的理想模式，把「大同」

思想與均同「社會/共產主義」。孫中山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是達致與大同社會共用共謀福利的「民生主義」，是否「烏托邦」則見仁見智，惟無可否認孫中山多年來為找尋有效的治國方案，對社會民生問題、經濟發展和國家理論體系等進行了無數次反思和辯證上的結果。

孫中山欲用新思想來打破舊思想<sup>[47]</sup>，是革命同時也是改良，並非去此取彼或此消彼長的單純邏輯，而是不停從學習和借助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將其與中國的特殊情形、歷史和傳統背景糅合，把適合中國本身的「主義」(-ism)建構和成立起來。相比起當時新文化思潮衝擊下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挑戰和鼓吹西化與激進主義，孫中山所建立的思想，完全是以中國為出發點，而非硬性貫徹他國所實踐的主義或文化性取而代之，他藉由「托古」以中國本位和傳統思想淵源為基礎，融合西方影響和學說，與昔往的改革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孫中山當時面臨的是國家往現代化急速轉變、戰禍導致民生疾苦的中國，以及社會文化劇變、新思潮湧入的年代。新思想對孫中山在思想無疑是種引介和參考，以便能以中國實際的情形對比運用、「托古改制」，其「托古」較之古人也更為合理和多樣化，不僅富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和獨特性，同時也不鼓勵極端盲動和拒絕隨波逐流，全然以當時尚未達到理想發展水準的中國社會實況為據，苦尋一套合適和有助於中國傳統往現代化過渡的具體方針。暫且不談孫中山在政治現實層面上的是非功過，單憑他在思想的建樹和論述上，應給予肯定。

[1] 劉子蘇、王惠震：《淺談托古改制與其產生原因》，載《學理論》，2011年第12期，第174頁。

[2] 同注[1]。有趣的是，〈井田辯〉中曾評論王莽為「烏托邦試行」的胡適（1891-1962），隨後竟也稱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會主義者」，對其「土地國有」、「均產」和「廢奴」政策持平反態度。見〈井田辯（四篇）〉，《胡適文集2：胡適文存》，第322-323頁、〈王莽〉，《胡適文集3：胡適文存二集》，第19頁；歐陽哲生



- 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3]「維基文庫」《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網上電子文獻：<https://zh.wikisource.org/>，2020年4月23日。
- [4]「維基文庫」（wikisource）中文版，《孟子》網上電子文獻：<https://zh.wikisource.org/>，2020年4月23日。
- [5]1905年11月26日，孫中山於日本東京發表了《〈民報〉發刊詞》，認為歐美的進步和發達歸功於民族、民權與民生等三大主義，普遍視為「三民主義」的最初版本。參見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頁。
- [6]「平均地權」是同盟會所制定的革命目標，最早出自1904年美國三藩市的《重訂華僑致公堂章程》，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次年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宣言中，也延續了原本綱領，原先與孫中山提出的「三大主義」無甚相關。孫中山於1906年《民報》創立一周年的講話上，再進一步闡明「民生主義」是社會革命，討論了解決土地租稅過苛將導致貧富不均的問題。參見《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1906），收於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第10-12頁。
- [7]〈民生主義之實施〉（1912）、〈三民主義〉（1919），收於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國父全集》（第三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第45-47、333-342頁。
- [8]〈述平均地權與在檀苦戰保皇黨致國內同志函〉（1903），收於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國父全集》（第四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第32-34頁。
- [9]〈鼓吹社會主義普及全國人民心中〉（1911）、〈亟須輸入社會主義新著譯以供研究瞭解〉（1912）；〈提倡國家社會主義〉（1912）、〈社會主義派別及方法〉（1912），《國父全集》（第二冊、第三冊），第434、440；73-75、97-112頁。
- [10]〈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提倡民生主義之真義〉、〈民生主義之實施〉（1912），《國父全集》（第三冊），第26-30、32-33、45-47頁。
- [11]〈提倡國家社會主義〉（1912），《國父全集》（第三冊），第73-75頁。
- [12]1917年7月17日，孫中山率領舊國會議員和海軍南至廣東宣導護法運動，以反對段祺瑞（1865-1936）政府拒絕恢復《民元約法》，於9月11日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擔任陸海軍大元帥。次年5月，軍政府以七總裁制取代大元帥制，迫使孫中山離開廣州；10月24日，廣州軍政府宣佈解散。參見張玉發，《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1985年），第211-214頁。
- [13]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第三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第350-353頁。
- [14]〈三民主義〉（1919），《國父全集》（第二冊），第337-340頁。
- [15]同上。
- [16][美]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頁。
- [17]〈社會主義與派別及方法〉（1912），《國父全集》（第三冊），第97-112頁。
- [18]王爾敏：《思想創造時代：孫中山與中華民國》（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第102頁。
- [19]1920年，孫中山聯絡親國民黨的粵北李烈鈞和粵東陳炯明等進兵廣州。次年國會再開，隨後選舉孫中山為廣州中華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參見張玉發，《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1985年），第363頁。
- [20]〈井田辯（四篇）〉，收於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胡適文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05-326頁。
- [21]周書燦：〈民國以來井田有無之辯綜論〉，載《河南社會科學》，2016年1月，第24卷第1期，第100-112頁。
- [22]〈三民主義基本政綱〉、〈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1912），《國父全集》（第三冊），第223、226-233頁。
- [23]陶季邑：〈五四時期國民黨理論家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載《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1期，第88頁。
- [24]〈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國父全集》（第二冊），第131-140頁。
- [25]孫中山將「共產主義」視為「社會主義」的通稱，除非原文如此，否則下文以「社會/共產主義」稱之。

- [26]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1924），《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第129-145頁。
- [27] 李雲漢：〈孫中山思想體系中的美國因素〉，收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編，《中山先生建國宏規與實踐》（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第272-276頁；柴扭，《紐約客》上的孫中山：「民生主義」到底是不是抄自美國牙醫，《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4293](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4293)，2020年5月12日。
- [28] 同注[26]，第129-145頁。
- [29] 同注[26]。
- [30]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1924），《國父全集》（第一冊），第145-157頁。
- [31]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理想主義與烏托邦-《大同書》中儒家與佛教的終極關懷〉，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2月號，第54-61頁。
- [32] 同上，第157頁。
- [33] 〈中國革命之難易〉（1910），《國父全集》（第三冊），第18-20頁。
- [34] 李吉奎：〈孫中山晚年文化思想中對傳統的因襲〉，載《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第108頁。
- [35] 〈與某日人的談話〉（1924），《國父全集》（第二冊），第600-605頁。
- [36] 張崑將指，孫中山是肯定程頤對孟子「天民之先覺」的詮釋和「行易知難」學說，從中認識到與其「民生主義」的關懷處境和實踐精神等都極相符，因此對儒學傳統進行了「創造性轉換」。參見張崑將，《孫中山對儒家思想的創造性轉換：以「道統論」與「行易知難說」為核心》，收錄於楊同慧總編輯，《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下冊），（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16年），第231-260頁。
- [37] 〈合五族為一體建設共和〉（1912），《國父全集》（第三冊），第77-78頁。
- [38] 《孫文學說》（1919），《國父全集》（第一冊），第351-405頁。
- [39] 馬政：〈三民主義與孟子思想（下）〉，載《三民主義學報》，1980年第4期，第188頁。
- [40] 同注[39]，第184頁。
- [41] 羅耀九、高常範：〈儒學對孫中山思想的影響〉，《學術月刊》，1996年第11期，第30頁。
- [42]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三講〉（1924），《國父全集》（第一冊），第157-170頁。
- [43] 同上，第145-157頁。
- [44] 高力克：〈孫中山的「大國之道」〉，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1年10月號，第40頁。
- [45] 同注[31]，第53-54、59-61頁。
- [46] 陳勇健：〈「井田制」與「烏托邦」：關於托古改制的一些討論〉，載《文化中國》，2018年第4期，第58頁。
- [47] 〈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1923），《國父全集》（第二冊），第371-379頁。

### “Tuo-gu Reformation” Thought in Sun Yat-sen’s ‘Principles of Min-Sheng’

Yoeng Jiann, Tan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Minnan Cultur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Project Assistant, Tao Seminary Malaysia)

**Abstract:**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lso known as the ‘San-min Doctrine’)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to be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modern socialism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from the root of Sun’s perspectives, it was also deri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from the past, through the method of ancient “Tuo-gu reformation” (or “Expressing modern affairs in ancient form”), which he combined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lity at that time, rationalized and forming a new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concepts applicable to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focus and discuss the changes in Sun Yat-sen’s thought on the “Principles of Min-Sheng”(or “Welfare Rights”)in each period, to rediscover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progressive in Sun’s unique thoughts of “Tuo-gu”.

**Key Words:** Sun Yat-sen,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uo-gu Reformation, Well-Field System, Principles of Min-Sheng